

◎ 趙深 編

趙萬里抄校本選編

【全十一冊】

中華書局

◎ 趙深 編

趙萬里抄校本選編

〔全十二冊〕
1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趙萬里抄校本選編：全 11 冊 / 趙深編．—北京：
中華書局，2017.1

ISBN 978-7-101-11728-8

I . 趙… II . 趙… III . 趙萬里 (1905 ~ 1980) —文集
IV . G256.2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6) 第 074879 號

ISBN 978-7-101-11728-8



責任編輯：徐 蜀 陳利輝
技術編輯：李曉明
封面設計：張克云



中華書局



古逸英華

趙萬里抄校本選編

(全十一冊)

趙 深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9 × 1194 毫米 1/16 · 390³/₄ 印張

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三河第 1 次印刷

定價：6600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728-8



趙萬里 (1905—1980)

出版說明

趙萬里（一九〇五—一九八〇），字斐雲，別署芸齋、舜齋等，我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，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弟子，精於版本、目錄、校勘、輯佚之學。先生歿後，以其長子趙深為代表的後人們，不斷搜輯、整理先生藏書、遺著等，並攜手出版單位，將其付梓，以弘揚先生之學。二〇一四年九月，我們合作將趙家所藏趙萬里先生過錄本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一書全彩影印出版，獲得了良好反響，也得到了趙家後人們好評。繼此成功合作之後，本次，趙深先生又從家藏遺書中遴選數種，輯為《趙萬里抄校本選編》，委託我們出版。

本書選收趙萬里抄本十七種、臨校本四種、手校本二種，底本各異，但均為清末民國時期本子，具體版本信息詳見各書內文之前的書名頁。所收諸書原訂為四十六冊，我們按照上述三種類型重編為十一冊，以下為原書卷次、函冊信息：

（一）《天一閣書目》不分卷，二冊；《錄鬼簿》二卷《續編》一卷，一冊；《墨子札記》一卷，一冊；《揚子法言校補》一卷，一冊；《公羊解詁誤字》《周明堂考》《群書治要引賈子新書校文》《賈子新書佚文輯補》《校讎通義箴言》，合訂一冊；《春秋繁露輯補》三卷，一冊；《周書補正》六卷，二冊；《老子輯補》一卷，《墨子拾補》二卷，合訂一冊；《莊子校補》一卷，一冊；《荀子輯補》四卷，一冊；《晏子春秋校補》二卷，一冊；《白虎通義輯補》二卷，一冊；以上均為趙萬里抄本，其中《錄鬼簿》二卷《續編》一卷，原為趙萬里、鄭振鐸、馬廉合抄本。

（二）《千頃堂書目》三十二卷，二函十六冊；《張說之文集》二十五卷，四冊；《欽定蒙古源流》八卷，四冊；《覆校穆天子傳》六卷《補遺》一卷，一冊；以上均為趙萬里臨王國維校本，其中《張說之文集》亦間有趙校。

（三）《澠水燕談錄》十卷存九卷，一冊；《說苑》二十卷，六冊；以上均為趙萬里校本。

上述諸書尺寸不等，我們影印時，采用如下原則：原書如能在開本範圍內放下，則原大製作；原書尺寸超出者，則保證版框原大，天頭地腳按原書比例各自適當裁切；原書尺寸超出且天頭地腳有批注而無法裁切者，則等比例縮

小，使其能在開本範圍內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。此外，有二種書較特殊：一為《張說之文集》，底本為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》影明刻本；一為《說苑》，底本為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》影明抄本。當年《四部叢刊》在影印時，將原書縮印了。而此二種書天頭、地腳、行間，均有大量蠅頭小楷批校，如以此為底本影印，批校文字閱讀起來會極有難度，因此，我們並未按《四部叢刊》本的尺寸影印，而是依據書前所提供的原書尺寸，依據以上原則處理，以使批校文字最大程度顯現，便於讀者觀覽。

另外，應趙深先生建議，我們在以下四種書後面附錄了相關文章，以備參考研究之用：《天一閣書目》一書之後，附《修建天一閣募捐啓》《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》《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》《上海涵芬樓藏書經眼錄》；《錄鬼簿》一書之後，附《鄭振鐸〈錄鬼簿〉跋》《明抄本〈錄鬼簿〉跋》；《澠水燕談錄》一書之後，附《〈澠水燕談錄〉佚文輯補》；《說苑》一書之後，附《〈說苑〉輯補》。文末，均注明刊載出處。我們以之為底本重新排印，過程中，我們發現，由於當時的編校或排版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，以致產生了訛、奪、衍、倒等錯誤。在最大限度保持底本面貌的基礎上，我們進行了一些更正，以便讀者使用。

最後，國家圖書館敦煌組劉波對趙萬里先生已有並繼續在做專人研究，在本書編輯過程中，也得到了他的不少幫助。在此一併致謝！

願本書的出版對相關領域研究有所裨益。

前言

趙萬里先生（一九〇五—一九八〇）是我國二十世紀成就最高的版本目錄學家之一，同時在校勘、輯佚等古籍整理領域有卓越的貢獻。由於種種原因，趙先生的多部版本目錄學著作沒有完成或刊行，祇留下了少量的稿本，趙先生親手抄錄或批校的部分書籍，幸運地度過「文革」浩劫，留存了下來。這些稿抄校本書，不僅頗具學術價值，還凝聚着一位大學者的心血和熱情。

本書選收趙萬里抄本十七種、臨校本四種、手校本二種。茲對各書基本情況略加介紹，以便研究參考。

一、抄本《天一閣書目》

天一閣是明嘉靖年間兵部右侍郎范欽創建的藏書樓，其鼎盛時期藏量達七萬餘卷，其中史料價值最高的，要數明代各省方志、明代各省登科錄等科舉文獻、明代及明以前碑帖拓本等三類。天一閣上層通為一廳，下層分為六間，寓「天一地六」之意，閣前有天一池。清乾隆年間建造《四庫全書》七閣，其規制據說即仿自天一閣。天一閣有一套嚴密的保管制度。建閣之初便立下「代不分書，書不出閣」的制度，范氏子孫分房掌管閣櫥鎖鑰，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，並立有「煙酒切忌登樓」等禁碑。這些制度使得天一閣歷經三百多年的風雨，保存至今。明末至民國間，天一閣屢遭侵奪盜竊，經歷過多次劫難，到二十世紀中葉，藏書僅存一點三萬餘卷。建國後，天一閣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藏書也得到保護與整理。現為天一閣博物館。

清代以來，成書的天一閣書目主要有佚名編《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》、阮元與范邦甸等編《天一閣書目》（附碑目）、薛福成等編《天一閣見存書目》、林集虛編《目睹天一閣書錄》四卷《附編》一卷、楊鐵夫等編《重編寧波范氏天一閣圖書目錄》、馮貞群編《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》十卷、駱兆平編著《新編天一閣書目》等。天一閣自清代歷經民國到目前的藏書演變情況，可以從中看到概略。

趙萬里非常關注天一閣及其藏書，他一生四次造訪天一閣。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八月，他與鄭振鐸、馬廉同往寧波，停留了一個星期，其間兩次探訪天一閣。但因范氏族長不在，無人負責招待，沒能登閣觀書，趙先生僅就天一閣的外觀規制作了仔細觀察：「細察閣的建築方式，和其他寧波住宅並無多少不同之點。所用材料簡陋非凡，消防設備簡直等於零。和藏《四庫全書》的文淵閣規模相比，真有天淵之別了。我不信文淵閣是模仿着天一閣蓋的。」

第二次在一九三三年七月，趙萬里以中央研究院、北平圖書館特派員的名義，經鄞縣縣長陳冠靈、鄞縣文獻委員會會長馮貞群（字孟顥）協調，與范氏家族達成諒解，獲准登閣整理藏書，編造目錄。這次編目歷時七日，趙先生「一個人負全部提調之責」，在多位同仁的協助下，用「較精密的統計法」整理了閣中所存的全部藏書，詳細記錄各書行款、邊口、版心大小、序跋、內容特點等信息。工作完竣後，公祭閣主范欽，並攝影留念。這次編目頗受關注，上海《申報》刊載了報道《中央研究院派員赴甬會編天一閣書目錄》，寧波《時事公報》也登載了內容相近的新聞。

趙萬里這次登閣編目，本擬編纂一部《天一閣書目內篇》，為每部書撰寫一則書志。他在《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》一文中給出了書志的樣例，從這則樣例看，書志內容包括書名、版本、序跋、行款、作者介紹、內容提要，可謂體大思精、周密詳明。此外，他還計劃搜集天一閣歷年散出諸書的信息，編輯《天一閣書目外篇》。如果這兩部書目得以完成，無疑將是版本目錄學的巨著。

可惜的是，這次編成的目錄稿本已經佚失。當年協助編目的馮貞群，對趙先生的編目計劃非常推重，一直關注此目的進展。據馮貞群外孫陳伯龍轉述，趙萬里後來告知馮貞群，此目稿本「在抗戰期間全都散佚了」（饒國慶《趙萬里與馮孟顥》，載《天一閣文叢》第十一輯，第二〇〇頁）。駱兆平《天一閣的藏書目錄》也記載：「一九六一年，趙先生函告筆者，此目當時未曾完稿，所抄錄的原始資料，在抗日戰爭時期已散佚殆盡。」（駱兆平《天一閣叢談》，寧波出版社，二〇一二，第四五頁）這是令人扼腕嘆息的大憾事。

第三次是一九四七年十月。趙先生曾致函馮貞群，接洽訪閣事宜。時天一閣已成立保管委員會，由范鹿其主持，馮貞群請趙先生與之聯繫。此次到訪的詳情，目前沒有更多資料披露。

第四次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、二十一日。當時趙先生受中央政府文化部委派，南下浙江、江蘇、福建等省調查圖書文物，寧波是其中一站。這次到訪，趙先生閱覽了明刻本《淮海居士長短句》、明嚴嵩纂修《（正德）袁州府志》、邵有道纂修《（嘉靖）汀州府志》、王瓚纂修《（弘治）温州府志》、盛儀纂修《維揚志》、姚昂纂修《（弘治）永州府志》、黃璿纂修《（景泰）建陽縣志》、唐胄纂修《（正德）瓊臺志》等珍本；又從《（嘉靖）建陽縣志》內摘錄刻工姓名三十三人，作為鑒定建本時代的資料；還看了天一閣近年新收的古書，如抄本弋陽腔《蟠桃會》、抄本《鏡裏花傳奇》等。

趙萬里還非常關注天一閣流散在外的圖籍。一九三〇年盛夏，他得到張元濟的關照，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訪書，過目了大批天一閣舊藏珍本。這次訪書，他撰寫了《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》一文；另外，所撰《涵芬樓藏書經眼錄》三十篇中，有十七篇寫的是天一閣舊藏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寇轟炸上海，東方圖書館被燬，趙先生的文章成了這些古籍的最後記錄。

本書影印的《天一閣書目》，當為趙萬里為調查天一閣藏書而搜集的資料之一。全書工楷抄就，分為二冊，書後附簽條：「□書半葉十行，白口，藍格，四周單邊，版心下方鈐『漫堂鈔本』四字。『玄』字不缺筆，當是清初寫本。」據此可知，趙先生抄錄的底本是清初宋犖抄本。這個本子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（索書號15852），書前鈐有「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」印，書後鈐有「長樂鄭氏藏書之印」，為鄭振鐸舊藏，著錄於趙萬里主編《西諦書目》（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六三，第四五頁）。鄭振鐸藏書在其一九五八年殉職後捐入北京圖書館，趙先生借抄此《天一閣書目》的時間，無疑在一九五八年之前，這個抄本也是二人深厚情誼的一個見證。

趙先生不僅一絲不苟地抄錄了這部書目，還對底本的某些明顯錯誤進行了校訂。如「英宗實訓（三本）」條，趙先生於天頭批注：「實，當作寶。」查宋犖抄本及與之同一系統的清初舒木魯介夫抄本（亦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，索書號17987），此字均誤作「實」。

二、抄校本《錄鬼簿》《錄鬼簿續編》

《錄鬼簿》記述金元時期戲曲、散曲作家及其作品，歷來是元雜劇研究最重要的基本文獻。民國以前，此書最通行

的版本是清康熙年間曹寅《棟亭藏書十二種》本。一九三一年，趙萬里、鄭振鐸、馬廉在寧波發現該書明抄本，附佚名著《錄鬼簿續編》，是戲曲史料的重要收穫。

一九三一年八月趙萬里與鄭振鐸的寧波之行，本意是探訪天一閣，但因范氏族長不在，未能如願。他們和在故鄉休假的馬廉一起，遍訪寧波藏書家。一日，在孫祥熊（蝸廬）庭前曝書堆中，發現了天一閣舊藏明藍格抄本《錄鬼簿》及《續編》一冊，他們一見便知這是「研究元明間文學史最重要之未發現史料」。於是向孫祥熊借歸，將其與康熙間曹棟亭刻本對校，確認《錄鬼簿》抄本可大幅補正曹本，《錄鬼簿續編》則為孤本。三人興奮異常，立即連夜分頭手抄，趙萬里抄《錄鬼簿》卷上，鄭振鐸抄卷下，馬廉抄《續編》，花了一整夜外加一上午的時間，終於抄成全書。在抄本的封面上，他們寫下一則題識：「二十年八月十六日海寧趙萬里、長樂鄭振鐸、鄞馬廉同寫，十八日畢。」一九三七年，北京大學為紀念馬廉教授逝世二周年，曾將這部抄本影印行世，不過印數不多，現在已經很不易得。

到一九四六年十月，明抄本《錄鬼簿》從孫祥熊處散出。鄭振鐸獲悉，舉債購得。一九五八年鄭振鐸殉職後，家人將其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，這冊明抄本《錄鬼簿》因而成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珍藏。一九五九年十月鄭振鐸遇難一周年之際，趙萬里與徐森玉聯名向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建議，影印明抄本《錄鬼簿》，以資紀念。次年，中華書局印成《天一閣藍格寫本正續錄鬼簿》，趙萬里為此撰寫了《明抄本〈錄鬼簿〉跋》，詳細記述發現、傳抄此書的經過。二〇一一年六月，此書又收入《中華再造善本》，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。

趙萬里在自藏一九三七年北京大學影印本上寫有批注多則。如關漢卿條批注：「《永樂大典》引《析津志》：「關一齋，字漢卿，燕人。生而倜儻，博學能文，滑稽多智，蘊藉風流，為一時之冠。」這是趙先生從事《永樂大典》輯佚工作時發現的新資料，後來即以這條材料為基礎，撰寫了《關漢卿史料新得》一文，刊載於《戲劇論叢》一九五七年第二輯。又如趙天錫條批注：「《（至順）鎮江志》十五鎮江路總管府判官趙禹圭，字天錫，河南人，承直郎，至順元年七月二十七日至，三年十月致仕。」則是利用地方志材料補證《錄鬼簿》的典型一例，馬廉《錄鬼簿新校注》（文學古籍刊行社，一九五七）未引及，王鋼《校訂錄鬼簿三種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一）對此也僅略有提示。又如，侯正卿條下「史侯心友良先生」一句，趙先生批注「史侯當是史天澤」，馬廉、王鋼等注家均未言及。諸如此類，均

有裨於《錄鬼簿》的校理與研究。

這部校本不僅有極高的學術價值，而且見證了一則現代書林佳話，具有特殊的意義。

三、抄本《墨子札記》

《墨子札記》爲陶鴻慶所撰《讀諸子札記》的一種。陶鴻慶（一八五九—一九一八），字彙石，號艮齋，江蘇鹽城人。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舉人，屢應會試不第，絕意仕途，潛心著述。著有《讀諸子札記》二十五卷、《讀禮志疑》五卷、《左傳別疏》二卷、《讀通鑑札記》十二卷等。《讀諸子札記》收有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列子》《淮南內篇》《呂氏春秋》《管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孫卿子》《墨子》《賈誼新書》《董子春秋繁露》《韓非子》《商君書》《公孫龍子》《尹文子》《尸子》等十七家，《墨子》爲第九種，分二卷。此札記以畢沅靈巖山館校刻《墨子》爲校訂底本，就部分難解文句詳加校箋，對畢沅、孫詒讓、俞樾等諸家之說多有辨正。

《讀諸子札記》有民國間文字同盟社排印本、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排印本、一九九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《陶鴻慶學術論著》本（陳引馳編校）。此外，該書還被收入多部大型子部叢書，如嚴靈峰所輯《無求備齋墨子集成》（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七）影印了文字同盟社本、中華書局本，任繼愈主編《墨子大全》第二編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）影印了文字同盟社本。

此趙萬里抄本卷首鈐「萬里手鈔」朱印，傳抄時間當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之間，即趙先生在東南大學求學時期。書眉有趙先生朱筆批校五則，對陶說及所引諸說略加評議或補充。如「號令篇嚴令吏民無敢讙罵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」條，陶鴻慶以「坐」爲「哭」之訛，引「哭」隸書字形與「坐」相近爲證。趙萬里批注則謂：「『坐』亦或作『𠂔』。」從「坐」的異體字「𠂔」與「哭」字形相近的角度，補充說明認定「坐」爲「哭」之訛字的依據。諸如此類，均不無參考價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抄本末葉以朱筆移錄劉師培（一八八四—一九一九，字申叔）跋文一則：

鹽城陳君鍾凡出示陶君鴻慶所撰《墨子札記》。《墨子》自孫先生撰《閒詁》，發疑正讀，若祛霧。今陶君復於孫說而外，發正數十事，其說之至精確者，如《尚賢》中篇「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」，君謂上「以」

字當作「能」，與上文合，《明鬼》下篇「是以莫放幽間」，君謂「放」當作「夜」，「夜」「放」形近；《經說》下「偏俱一無變」，君以「偏俱」爲句，二字對文，與《荀子》義合。若是之屬，均屬墨書定解，其釋《備城門》以下各篇，亦多初獲，足與孫說並傳云。丁巳年初夏，儀徵劉師培記。

丁巳爲一九一七年，時在劉師培逝世前兩年半；當年秋，劉師培受聘爲北京大學教授。此跋文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、萬仕國輯校《劉申叔遺書補遺》（廣陵書社，二〇〇八）均未載，陳奇《劉師培年譜長編》（貴州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七）也沒有記載相關信息。趙先生所錄，可爲劉師培研究提供新的資料。

四、抄本劉師培校勘學著作十四種

趙萬里負笈東南大學期間，便潛心於古籍校勘之學，服膺劉師培的校勘學成就。劉師培爲劉文淇（一七八九—一八五四）曾孫，承續家學，在經學、史學、文學上均有卓越成績。趙萬里入大學時，劉師培已故世。他讚賞劉師培的學術成就，歷時數年編成《劉申叔先生著述目錄》，後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發表在《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》第一卷第六號。此外，他還手自抄錄劉師培校勘著作，或將其校語移錄在自藏書籍上。如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便在自藏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劉文典《淮南鴻烈集解》書眉移錄劉師培校語，並在書前簽條上寫下識語：「《劉氏遺書》卷五《淮南子補校》（盧校莊本），今移錄於眉端，以便省覽。甲子四月十六日。」

趙萬里手抄的劉師培校勘學著作現存十冊，所抄爲《揚子法言校補》《公羊解詁誤字》《周明堂考》《群書治要引賈子新書校文》《賈子新書佚文輯補》《校讎通義箴言》《春秋繁露輯補》《周書補正》《老子輯補》《莊子校補》《墨子拾補》《荀子輯補》《晏子春秋校補》《白虎通義輯補》等十四種。《劉申叔先生著述目錄》在多個條目下注明「余錄有副冊」，指的就是這批抄本。

這批抄本各冊首葉往往鈐有「趙」「萬里手鈔」二朱印，書中又往往有趙先生手書批校。如《老子輯補》第六葉「《文子·道原篇》引作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』（當作知，係後人據《老子》俗本改）」一句，趙萬里以朱筆在天頭批注：「武英殿本《文子》『能無爲乎』正作『能無知乎』。」爲劉師培說補充版本依據。又如，同葉末行「以字同，且《韓非子·解老》篇引『夫道者，忠信之薄』句」一句，天頭有朱筆批注二則，其一曰：「『且』疑『耳』字」，校正

《左盒叢書》的誤字；其二曰：「下『夫道者』句『道』字當是『禮』字」，校正劉師培引文誤字。又如《晏子春秋校補》「治國之患」條，趙萬里批注：「《治要》亦引此節入《問上篇》，劉氏失校，蓋偶遺也。其異同今具見蘇氏《集解》。」補正劉師培失校。再如《莊子校補》第四葉「兀倪，倪伋，僉訓弗安」句，趙萬里批注曰：「兀倪，亦作机隍，見《尚書》。」援引他書補證劉師培論述。凡此種種，都對研讀劉師培著作有所幫助，對於校理這些古籍也不無參考價值。

這批抄本的抄錄時間，趙先生並沒有詳細注明。不過，周作人《左盒詩》一文記載，趙先生曾告知他，這批書是「昔年在南京據刻本移寫者」。「在南京」即負笈東南大學時期（一九二一—一九二五）；用作抄錄底本的「刻本」，即《左盒叢書》。劉師培文集《左盒叢書》流傳不廣，刻本如今已很難尋覓，即使中國國家圖書館也僅存有《周書略說》《周書補正》二種，另有《老子斟補》抄本一種，合計三種。趙先生據刻本移錄的這批抄本，也是難得的資料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批抄本在保存劉師培著作方面曾有過很大貢獻。

一九三四年，錢玄同、鄭裕孚等校勘劉師培著作，編輯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。錢玄同與趙萬里有戚誼且熟識，編校過程中得到趙萬里的不少襄助。錢玄同曾致函鄭裕孚：「《左盒集》弟所見者，亦祇有張伯英重刻本，其原刻本弟從未見過。閱趙萬里之目，彼似曾見之，不知彼有此書否，請一詢之何如？」又一函謂：「趙抄《老子校補》與《墨子拾補》一本，先遵示奉還，即希檢收爲荷。……《白虎通義校補》（摘錄，未完）全書凡二卷，趙萬里先生有抄本。」據此可知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所收的《老子斟補》《墨子拾補》《白虎通義斟補》等書，校排底本便是趙萬里手抄本。

此外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丙類「群書校釋」諸書中，《晏子春秋校補》《荀子斟補》《群書治要引賈子新書校文》《春秋繁露斟補》等書，也注明以抄本爲底本或底本之一，所用抄本應當也是趙萬里抄本。錢玄同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鄭裕孚函謂：「正擬修書，忽得手教並劉著四本，敬悉。此四本經趙先生再四校閱，誤字已改正不少。」此處提及的「四本」具體指哪四部書，今已無法確指，不過這段話可以佐證，錢玄同等所用趙萬里抄本遠不止《老子斟補》《墨子拾補》《白虎通義斟補》等三書，《晏子春秋校補》等也應在內。

另據周作人《左盒詩》一文所記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所收《周書補正》的校刊底本，也是趙萬里抄本。這批抄本的學術史價值，從這裏也可略見一斑。

五、臨王國維校本四種

王國維治學，以校勘古書、辨證史料爲「預備工夫」，「如治甲骨文，則先釋《鐵雲藏龜》及《書契前後編》文字。治音韻學，則遍校《切韻》《廣韻》。撰蔣氏藏書志，則遍校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等書不下數十種。其他遇一佳槧，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，間有心得則必識於書之眉端」（語出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）。趙萬里所撰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，著錄批校本多達一百九十二種。趙萬里受這種學術方法的熏陶，也「酷嗜校書」。他還大量臨校王國維校本，今存者近二十種，本書選印四種。

其一爲《千頃堂書目》。該書是清初黃虞稷所輯的私家藏書目錄，全書三十二卷，著錄圖書一萬三千餘種。其中別集十三卷，尤以明別集爲主。明人著述以此目著錄最爲全面，《明史·藝文志》即以此書所錄明人著作爲藍本補綴而成。此書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然清代未刊刻，僅有抄本存世。一九一三年，張鈞衡據王紹蘭漢唐齋、王宗炎十萬卷樓兩部抄本加以校訂，刻入《適園叢書》。

王國維一九一九年十月起應蔣汝藻之聘，爲蔣氏密韻樓編纂藏書志。歷時五年，撰成《傳書堂藏書志》。其間利用蔣氏藏書遍校群籍，《千頃堂書目》爲所校書中最精審者之一。一九二二年農曆閏五月，王國維以蔣氏藏海寧陳鱣（字仲魚）抄本《千頃堂書目》校《適園叢書》本；六月，又以《明史·藝文志》對勘一過。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著錄王國維校本：「校烏程蔣氏藏吾鄉陳仲魚舊藏抄本。陳本較此本多出數百條，均於眉端錄之；又以《明史·藝文志》校之，其見於《藝文志》者，以朱筆爲識，復據烏程蔣氏密韻樓所藏書比勘其書名卷數異同，丹黃滿卷，自爲先生手校書中之最精者。」此王國維校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（索書號A03987）。

一九二七年王國維離世後，趙萬里花費半年時間，據王國維校本以朱墨二色移錄其校語於自藏《適園叢書》本，後錄王國維跋三則，以及杭世駿題跋二則。臨校完畢，趙萬里寫下一則跋文：「丁卯歲不盡二日，臨觀堂先生校本畢。自夏徂冬，中又別治他業，時作時輟，然終得校成。感歲月之侵尋，歎華年之非昔，掩卷喟然，爲之歛歔。萬里謹記。」

其二爲《張說之文集》。該書是唐代政治家、文學家張說（六六七—七三〇）的文集，存世最早的版本爲明嘉靖

伍氏刻本。一九一九年，商務印書館將其收入《四部叢刊》，影印行世。一九二一年，王國維反復校勘此書。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載，當年四月，王國維「以蔣氏藏明鈔本《張說之文集》校《四部叢刊》影明嘉靖本，訂正誤字千餘，至五月初旬校畢。明鈔本與結一盧朱氏刻本佳處大同。又以《唐文粹》檢校一過，遂成善本矣」。次年四月，又以結一盧刊本《張說之文集》校嘉靖伍氏刻本，至五月初校畢。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著錄王國維校本，謂：「校烏程蔣氏藏明鈔本及朱氏結一盧校刊彭文勤知聖道齋鈔本；又檢《唐文粹》所引細勘一過，共補缺頁數處，訂訛字千餘，殆成善本矣。」王國維校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（索書號A02906）。

此校本不僅保存了王國維的校勘成果，還包含了趙萬里的校書心得。書中有朱墨二色校語。王國維原書於天頭的校語，以朱筆或直接移錄或引述於地腳，有的還附有趙萬里按語。朱筆眉批則為趙萬里據《文苑英華》校。墨筆亦為趙萬里校。師生二人的校勘成果薈萃一本，頗具參考價值。

其三為《欽定蒙古源流》。該書記載明代蒙古地區史事與社會最為詳實，與《蒙古秘史》《蒙古黃金史》並稱為蒙古三大歷史名著。著者為小徹辰薩囊台吉（一六〇四—？），成書於明末，清乾隆間譯為滿文，再由滿文譯為漢文。清代學者魏源、張穆、洪鈞等都對該書有過研究。王國維對該書用力甚勤。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載，一九二五年九月，假沈庵宮保（寶熙）藏薈榑書屋鈔本《蒙古源流》以校坊刻本。十一月中，又讀數過，並據《元秘史》《元史》等書校釋一過。王國維批校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（索書號A02231）。

王國維校注本擬整理刊印，但因「無佳本可校，滿蒙文原本倉卒亦無由通其讀」而作罷，未能與《蒙韃備錄》《黑韃事略》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《聖武親征錄》四書校注一起印行（此四書校注於一九二六年合刊為《蒙古史料四種校注》），學者無從參考。張爾田整理沈曾植《蒙古源流箋證》時，曾據此趙萬里臨校本移錄王國維校語。張爾田在該書序文中說：「此書寫成，復從趙君萬里假得傳錄亡友王靜安本。……惟靜安簡端籤語郅精，頗可與斯箋印合處，今遴其確當及小有意者都載箋中，稱王靜安校以別之。原稿仍歸趙氏。」

此趙萬里臨校本之前，有張爾田一九三一年所作跋文一則，可與《蒙古源流箋證》張爾田序文相互印證。其文曰：

此亡友王靜安據薈榑書室舊鈔校本而趙君萬里逐錄者也。今春理董沈乙盦尚書《蒙古源流事證》，從趙君假得

此本，據以入錄。薌楂舊鈔較之通行各本，雖間有是正，文字劣而脫落亦未能盡補，末卷闕字至數行，其尤著也。惟靜安簡端時列籤語，精確殊多，頗有與乙盒丈暗合者，足見學者讀書之不苟。趙君為靜安入室弟子，遺書皆出其手定。欣斯道之有傳，悲故人之長往，泫然書之。辛未首夏張爾田題記。

其四為《覆校穆天子傳》。該書為晉代汲冢所出古書之一，記周穆王巡遊故事。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載，王國維於一九二〇年農曆三月「於蔣氏密韻樓見盧弓父校本《穆天子傳》，以校翟云升校注本，見翟校多與盧說合，似翟氏曾見盧本也。先生又增釋若干條，又兼采沈乙盒先生說注於眉端。」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則謂王國維校本「校明天一閣刻本及盧弓父校本，並有眉注數處」。王國維批校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（索書號A02892）。

此趙萬里臨校本卷首鈐「桂廬」朱印，可知原為清代陳其榮舊藏。卷末有題識：「丁卯七月十七日，萬里過校，時客滬上。」臨校時間為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（農曆七月十七日），恰好是王國維下葬之日。

卷末錄盧文弨識語三則：「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嘉平月盧文弨校。」「己亥三月廿八日得抄本，又看一過。弓父記於崇文書院。」「癸卯八月庚申朔，以《道藏》本校訖。弓父記於山右之三立書院。」又錄王國維識語一則：「庚申三月見盧抱經先生校本，無甚異同，摘其要錄之。翟校多與盧合，似曾見盧本也。國維記。」

這些臨校本，既繼承了王國維手校書中的精華，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，還見證了王國維、趙萬里的學術傳承，不失為近代學術史的重要資料。

六、手批手校本二種

趙萬里手校手批本今存三十餘種，本書選印二種。

其一為《澠水燕談錄》。該書是宋人王闢之所撰的筆記，記錄了衆多士大夫的議論，可謂宋史與宋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料。《郡齋讀書志》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該書，但今傳本已並非完帙。趙萬里以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為底本，詳加批校，並在卷末補佚文三則。

趙先生在《〈澠水燕談錄〉佚文輯補》一文之前的小序中寫道：「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錄》無善本久矣。世所傳黃堯圃校宋本與知不足齋刊本無大出入，疑黃氏所據非實，或所據乃宋末坊本。余嘗據頌芬室刊本江少虞《皇朝事實類

苑》、元刊本《事文類聚》、影宋本朱子《三朝言行錄》、校明抄本《詩話總龜》、《道藏》本《三洞群仙錄》、嘉靖本《錦繡萬花谷》、《百川學海》本《厚德錄》及蜀本《分門古今類事》、《苕溪漁隱叢話》諸書所引勘之，全書改訂凡萬餘字，而前後錯落尚不在內。」可謂用功甚勤、收穫至巨。該文序言以舉例的方式，列出改訂的「犖犖大者」五條。但更多的校記並未整理成文，學者無緣參考。

《〈澠水燕談錄〉佚文輯補》是趙先生於一九二八年暮春完成的輯佚之作，校錄佚文二十三則，大部分爲此後整理本所沿用，但也有「予嘗修玉牒」「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」「曹修古明道初爲御史知雜」等數條，似未被充分注意。

其二爲《說苑》。該書是西漢末年劉向所撰的筆記小說集，分類記述戰國秦漢遺聞軼事。該書近代最爲學者推重的版本，是一九一九年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》影印明抄本。趙萬里即以該本爲底本，詳加校理，朱墨燦然。其中墨筆多爲引盧文弨校語，朱筆部分多趙萬里讀書心得。部分校語整理爲《〈說苑〉斟補》一文，一九二八年十月刊於《國學論叢》第一卷第四號，計一百三十八條。這篇文章是典型的古籍校勘之作。王謩《續補藏書紀事詩》在趙萬里、陳乃乾條下自注曰：「後讀萬里所著《〈說苑〉斟補》，見其出入宋元精本，揮斥諸校勘家不遺餘力，乃幡然曰：學問之道，其如是耶！」可謂推崇備至。

此後，趙萬里仍長期關注《說苑》的整理工作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他在清華大學等高校講授校勘學、目錄學，《說苑》的版本與校勘是課程內容之一。比如一九三三年擬就的清華大學講義《目錄學十四講綱目》中，便列有「校勘《呂覽》《淮南子》《說苑》《新序》之新舊材料及其版本問題」一節。

一九六一年三月，趙萬里又在《文物》雜誌發表《唐寫本〈說苑·反質篇〉讀後記》一文。該文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遺書三二八號《說苑·反質篇》校萬曆年間程榮《漢魏叢書》刻本，得異文三百餘處，文中舉出與《群書治要》《北堂書鈔》、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《說苑》及《晏子春秋·雜篇》《漢書·楊王孫傳》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相合者二十四條，指出「唐寫本《說苑》不僅是校訂明刻本《說苑》的重要資料，同時也是校訂《晏子春秋·雜篇》《漢書·楊王孫傳》《孔子家語·觀周篇》等書的輔助資料」。此外又列出佚文四處。文末分析了傳世本與唐寫本之間差異如此巨大的原因：《反質篇》北宋時亡失，後人從高麗本補足，而高麗本曾經後人傳寫失真，因而造成了衆多文字錯訛。